

京杭大运河与镇江城市文明的兴起和发展

王玲真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古代的城邑往往首先出现在交通要道上,或港口、河口、山口或军事要冲。镇江是长江的重要港口,属东南锁钥之地,且城中有山,山中有城,本身就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贯通更为它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交通的便捷使处于运河和长江交汇处的镇江迅速发展成为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可以说,古运河承载了镇江从古到今的财富与文明,记载了镇江的历史变迁,孕育了镇江的城市文化。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 镇江; 漕运; 京口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22; F29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59(2008)01-0021-04

一、千年运河与古城镇江

人工河道的开凿在镇江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著名的丹徒水道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存在,它南起云阳(丹阳),北由丹徒入江,是其后江南运河北段通河航道的雏形“曲阿”。丹徒水道的开凿可以说是古代镇江人的伟大创举,它将太湖水域与万里长江沟通起来,加强了中原地区与东南蛮夷的联系,成为先秦南北交往的重要纽带之一。秦代丹徒水道入江口再度西移。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第五次东巡到镇江一带,派赭衣囚徒凿断京硯山东南龙目湖中的长冈,使“水北注江也”^[1],即在丹徒口之西又开凿了一条入江河道,因在京口里,古称京口。京口的开凿缩短了入江口与邗沟的距离,改善了江南入淮的航线,减少了舟行的危险。

孙吴在建业(今南京)定都之初,吴会漕输主要是丹徒水道,由京口或丹徒口出江,达于建业。为了避免江南漕赋经由京口到建业所要经历的长江风涛之险,就另行开辟了一条由句容直接通向金陵的人

工渠道。孙权派遣校尉陈勋凿“破冈渎”,以通吴会船舰。破冈渎位于句容县南部,东西走向,西通秦淮水系,东入延陵、云阳,与丹徒水道相通。由于系凿山辟岭而成,故称“破冈渎”。梁武帝时又废“破冈渎”而立“上容渎”,两渎路径略有不同,但都是由句容经丹徒、丹阳交界处的宝堰,过赤山湖而至建业的。六朝时期,两渎避开长江,经由内地沟通了秦淮河——太湖水系,加强了政治中心建业和经济中心吴会及军事重镇京口间的交通联系,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开发。

隋统一中国后,建都长安,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而为普通郡邑,才又恢复了由京口入江的水道交通。炀帝大业六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2]。因此《顺镇江志》说:“京口有渠,肇自始皇,非始于隋也。……炀帝除非创置,不过使宽广耳。”^{[3]277-278}江南地区经过六朝经营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隋书·地理志》记述三吴地区曰:“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之会也……

收稿日期:2007-12-04

作者简介:王玲真(1982-),女,河南巩义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14]三吴的丰饶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对隋政权有极大的吸引力。对陈朝旧域的统治,需要一条通畅的河道。政治需要促使隋政权把调整和改善交通条件作为经营三吴、加强控制的手段。

江南运河镇江段“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15],凝聚了多少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运河贯通后,自是天下利于运输,更“为后世开万世之利^[16]。不过由于隋朝比较短暂,杨广又是个有名的昏君,因此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开河事业反倒成了他劳民伤财的一大罪状。大运河的功用以后各代才充分显示出来,唐宪宗宰相李吉甫说过:“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17]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诗句赞之:“平湖七百里,沃壤二三州。”这正是江南运河的壮丽景象。江南运河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便利了水上交通,而且配合着太湖平原水利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沿线各城市的发展,镇江也深受其利,不仅“自是以后,南北渡者皆以京口为通津^[18],而且提高了镇江在江河水运中的枢纽地位。镇江水运的畅滞,开始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镇江作为江南运河的入江口,具有得天独厚的江运、水运优势。江浙太湖流域的物资经江南运河到镇江港中转输往各地,北方的物资也经江北运河过镇江港转输东南江浙一带,港口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镇江得以在古代成为东南的重要政治、经济区域和军事重镇,以后则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以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著称的城市。可以说镇江因水而起,因水而兴,如果没有大运河的开凿,就不会有其南北交通枢纽的地位,也不会有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繁荣的经济。

二、漕运的兴盛促进了镇江经济的繁荣

隋代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唐宋两代对江南运河镇江段的不懈治理,扩大了镇江的水运规模。中唐以后,镇江成为漕运咽喉、中原政治中心和东南财赋之区的交通枢纽。随着江南经济的不断发展,南粮北运渐成定制。大规模的漕运成为镇江水运的主体。一般情况下,太湖和钱塘江地区的漕粮、贡赋,都是由江南运河运至镇江,再转运到北方的;甚至两广的许多物资也从镇江中转。宋《嘉定镇江志》云:“京口当南北要冲,控长江之下流,自六飞驻跸吴会,国赋所贡,军需所供,聘介所往来,与夫蛮商蜀贾,荆湖闽广,江

淮之舟,凑江津,入漕渠而径至行在,所甚便利也。^[19]北宋在镇江设立转船舱,南宋设立大军仓,镇江成为粮食仓储中心。

唐朝每年从东南漕运到京师的粮食自数十万石至一二百万不等,北宋时两浙路(浙东、浙西)岁供漕粮150万石,明清时常年南粮入漕数有二三百万石。^[10]漕运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镇江对维系封建王朝统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镇江港畅通,则全国政局稳定;镇江港阻滞,则政局将陷入困境。所以在唐宋以后,镇江一直是江南政治、经济、行政中心。清代康熙、乾隆南巡,每次都到镇江,可见镇江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清道光年间江苏巡抚林则徐几次来镇江整顿漕政,改革弊端,以确保漕道畅通无阻。他还曾亲自督运漕米过江,体现出镇江作为东南漕运咽喉在清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漕运的兴起,使镇江也成为商货中转港口。唐宋时的东南茶叶,江西景德镇的青瓷等经运河北上泛销北方中原地区,并有相当数量在镇江出售。南宋时江西的梁米,淮南的茶盐丝帛,荆湖的金铁羽毛经镇江进入运河大量运往临安,供应京师。在镇江常州河段上,百舟千帆往来不绝,大小码头熙熙攘攘,热闹非常。《瓜洲伊娄河棹歌》记述了当时漕船从镇江过江的情景:“粮艘次第出西津,一片旗帆照水滨。稳渡中流入瓜口,飞章驰驿奏枫宸。”宋代市镇兴起,江南运河仅镇江段就有吕城、陵口、新丰、丹徒等旺镇。而且当时镇江全府的商税额占全国第十一位。商税的增多反映了其商业的发达。到元代,镇江商贸税额计通钞19万贯,在江浙行省中排第一位。^[11]

水运的便利,使得镇江不管是州郡官吏还是百姓都大搞商货转运,纷纷下海经商,聚敛财富,一时“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12]。侨居京口的刁氏尤其善于经商,刁协在永嘉之乱率家族南渡时,就在建业、京口一带“取将吏客使转运”,他的兄弟子侄个个“以货殖为伍”,很快暴富,拥有田地万顷,奴婢数千,其孙刁逵仗着权势、财势封山占泽,成为“京口之蠹”。后来刘裕将其翦除,刁氏家资财产俱散给老百姓,据说众人尽力而取,竟日不完。“京口职吏数千人,前后居者皆致巨富。^[13]在京口做官,不搞运输经商者,寥寥无几。当地百姓也多以商贩为业。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少时居京口,就有卖履的经历。

京口的这种经商之风促进了当地商贸业的发展,各种经营商行如粮行、布行、酒行、鸡鸭行、地货

行等充斥城内外,伴随着商业的活跃,服务行业也发展起来,旅店、酒楼、茶馆、戏院、书场、浴室等遍布城内外大街小巷。镇江的“银码头”吸引了大江南北各地商贾,外地客商云集镇江者无以数计,由此又推动了餐饮业的发展。清代镇江工商业发展到极盛。康熙《江南通志》称:“京口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14]

镇江是港口、河口城市,为适应江运、河运之需,造船业、修船业自古发达,成为手工业的支柱产业。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镇江知府赵善汀教浮水军五百人,又制多桨船五百艘,无论风势逆顺,“捷疾如飞”,其中赤鸟、白鹅两大舟可载2000余人。明清时,镇江造船业有了新的发展,可以制造战船、驿船、粮船和商船等各类船只。造船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相关产业,如缆索、桐油、铁钉、木材加工等行业的兴盛,城外运河沿边的打索街即源于宋代,至明清时成为临江口的繁荣地段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人口的增多,镇江形成和发展了许多街市。众多街市星罗棋布、交错纷纭,或坐落于通衢大道,或分布于运河沿线。这些街巷名称各异,五花八门。

因为镇江是手工业者的聚集地,所以就有了剪子巷、簸箕巷、篾篮巷、盆汤巷、磨刀巷、胭脂巷、梳儿巷。镇江又是港口城市,所以就有了丹阳码头、小码头、东码头、溧阳码头、御码头、东坞街、西坞街。集市地段也有鱼巷、砖瓦巷、石灰巷、白莲巷、梁米仓巷、染坊巷、牛皮巷、柴炭巷之类的。而市民活动娱乐的场所就更多了,什么花巷、果子巷、跑马巷、狮子巷、蛤蟆院、琴园巷、书场巷、荷花塘巷、桃花坞……。就连镇江的地名也可以说出个一二三四的,有一泉路,二道巷,三官塘,四牌楼,五条街,六摆渡,七里甸,八角亭,九里街,十八进,五十三坡,千秋桥,万古一人巷。仅一条西津渡街就能浓缩中国的一段历史,有所谓“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华夏还有哪个城市哪个街道能与之媲美的呢?

镇江城内,街市店铺临河而立,茶肆酒楼众多,著名的万岁楼、芙蓉楼等一批名楼都创立于这一时期。镇江出产的北府酒更是名闻天下的好酒,当时流行一条谚语“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运河上建有八座桥,其中尤以绿水桥最为有名。运河两岸,杨柳依依,风景如画。北宋诗僧仲殊填有《绿水桥》一词:“南徐好,桥下绿波平,画柱千年尝有鹤,垂杨三

月未闻莺,行乐过清明。南北岸,花市管弦声,邀客上楼双榼酒,舫舟清夜两岸灯,直上月亭亭。‘晚唐大诗人杜牧漫步在绿水桥边,也不由得吟道:‘清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唐刘禹锡的《重送李相公顷廉》诗也描绘了城内的盛况:‘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钺。凤从池上游沧海,鹤到辽东识旧巢。城下清波含百谷,窗中远岫列三茅。碧鸡白马回翔久,却忆朱方(即镇江)是乐郊。’”

三、运河造就了多样的“京口文化”

运河的贯通,大大便利了镇江与全国各地的交通。交通的发达又促进了镇江地方经济的繁荣,从而为镇江城市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镇江成为江南著名的大都会,吸引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学者前来探访游览,再加上南下移民一直连续不断,于是就形成了多样的文化氛围。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碰撞,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互补,楚汉文化与吴越文化的融合,使得镇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运河文化。

镇江古称“京口”,镇江文化就以“京口文化”负有盛名。京口文化具有兼容并包,多元性、多样化的特点。镇江号称“江城”,这样看来似乎长江文明是镇江的惟一依托与代表。但从镇江城市的发展来看,运河与京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为密切。运河的航运功能派生出了漕运文化和由此形成的商业文化、山水文化、移民文化等。可以说没有运河,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京口文化”。

一是镇江运河历史悠久,城市兴衰,皆系于此。京口文化的兴起繁荣也伴随着运河源远流长。历代文人学者乘舟沿着运河,顺流而下,寻访到了镇江这块山水胜地,使其很快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元代学者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说:“京口江山,为天下冠。清淑之气,扶舆盘礴,以钟乎人者,代不乏材。……是以上下千数百年,名公巨卿,鸿儒硕彦,项背相望。或以节义励俗,或以政事裕民,或以武略定乱,或以文学垂范。至于高蹈物表,远引方外,亦皆清俊卓绝之士,是其遗风逸尘,沾被无极。”^[15]六朝时,京口文化处于鼎盛时期,“六代风流人物萃于斯”;而南朝文化可以说是镇江最大的文化品牌。从葛洪的《抱朴子》、萧统的《文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徐陵的《玉台新咏》、到刘勰的《文心雕龙》,祖冲之的圆周率可以说开中国学术之先河。之后又有北宋沈括的科技名著《梦溪笔谈》,明末计成的造园学说《园冶》,清初张玉书主

持编撰的《康熙字典》,沈德潜的《古诗源》,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刘鹗的《铁云藏龟》等等,这些作品雅俗兼备,异彩纷呈,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闪烁着京口文化特有的光辉与风采。

二是镇江属山水型城市,城外有长江,城内有运河,而古运河则是城内的主水道,因此,京口文化的山水文化中,运河独擅一面,举足轻重。江畔的重峦叠嶂,运河水的碧波荡漾,美妙的传说故事,古香古色的庙宇楼阁,使镇江名满天下。于是风流才子,文人墨客,乃至帝王将相都来到了这方钟灵毓秀之地,给镇江带来了人文意蕴的渗透和积淀,自然山水便成为一种人文景观,从而也在另一层面上表现出与自然山水特征紧密联系的文明精神。

“京口三山”中的北固山流传着许多关于孙权、刘备联合抗曹的传说故事,集中展示了三国文化现象。其中最有名的是甘露寺刘备招亲,加之山上还有太史慈墓、多景楼等三国遗迹,更是给京口增添了神秘的三国文化色彩。三国史实的记载,三国典故的流传,三国文化的魅力,历史上吸引了许多名家到北固山寻访三国遗迹,也使北固山“真山真水”的壮观为天下所认识。金山在南朝时期就是江南佛教圣地,金山寺成为天下僧人参禅悟道的地方,佛教文化底蕴极为深厚。而焦山碑林宝墨轩,被誉为书法之山,数量之多仅次于西安碑林,为江南第一大碑林。此外还有道家第一福地——茅山,律宗(佛教中的一大派别)第一名山——隆昌寺等。这些无不体现着镇江自然与人文、山水与文化的交流与融洽。

三是镇江是南北交通枢纽,水陆要冲,就文化交流影响而言,南北交流要大于东西交流,顺运河南下的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来自黄河流域的先进文明,其影响远远大于沿长江东流的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因此镇江虽名为江南历史名城,但无论在物质生活、风俗习惯、语言还是在文化特征上都明显带有北方的特征,如方言上属北方语系的江淮次方言,俗称“下江官

话”;饮食习惯上不像南方完全以米饭为主,面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镇江三怪之一的“锅盖面”就是很好的例证;性格上除带有南方人精明的一面,更有北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农田耕作,不仅有种植水稻,也大量地种植粟麦,因而在很多人的眼里,镇江是座位于江南的苏北城市,镇江人更像江北大汉。之所以有这样明显的北方特征,是因为从先秦至近代,大量北方移民不断南下,对镇江经济进行着连续不断的影响,使得这座城市明显地带有移民城市的特征。

可以说,运河是镇江成为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南来传播、融合的载体,强大的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借助运河之水将本地的吴文化稀释、变异,使其独具风貌。运河是京口文化地方特质形成的重要原因,与长江一样,也堪称镇江文明的母亲河。

参考文献:

- [1]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七.刘桢.京口记[M].
- [2] (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M].
- [3]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上册),卷七.山水.水.丹徒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4] (唐)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一.志二十六.地理志下[M].
- [5] (南宋)陆游.入蜀记,卷一[M].
- [6]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六[M].
- [7]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五[M].
- [8]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M].
- [9] (南宋)卢宪.嘉定镇江志,卷六.山川.丹徒县[M].
- [10] 严其林,程建.京口文化[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1] 张大华.镇江文化旅游[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 [12] (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M].
- [13] (唐)李延寿.南史,卷十八.列传第八[M].
- [14] (清)黄之雋.江南通志,卷十九.风俗[M].
- [15]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下册),卷十八.人材[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钱荣贵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Civilization of Zhenjiang WANG Ling-zhen

(School of Human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ities were usually built near traffic arteries, such as ports, estuaries and fortresses. Zhenjiang is an important port built within the valley of mountain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nd is also a fortress to the southeast areas in China. The excavation and completion of the Grand Canal provided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Zhenjiang, and promoted Zhenjiang to be a famous city of ancient cultur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Grand Canal carries the fortune and civilization of Zhenjiang, record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Zhenjiang and fosters the urban civilization of Zhenjiang.

Key words: the Grand Canal; Zhenjiang;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Jingkou Culture